

· 告 · 别 · 二 · 十 · 世 · 纪 · 哲 · 学 · 随 · 笔 · 丛 · 书 ·

HUAYU DE ZHENXIANG

话语的真相

陈家琪 · 著

在充满谎言的世界

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

而语言的贫乏与单调

也同时预示着思想的枯竭

更谈不上道德的自信与自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告 · 别 · 二 · 十 · 世 · 纪 · 哲 · 学 · 随 · 笔 · 丛 · 书 ·

萌萌 主编

话语的真相

陈家琪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告别二十世纪哲学随笔·

话 语 的 真 相

陈家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33,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840-0/G·474

定价 16.50 元

总 序

近来,随笔在全国方兴未艾,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发现,这种贴己的、自由的文体,在写作和阅读中建立起了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方便沟通 and 理解的纽带。但我们恰恰是迟疑着不信任轻易许诺认同前提的沟通 and 理解。

我们持有一种试探的入思态度和与此同步的写作态度,即既与诗化、浪漫化保持距离,也不在一般意义的人生沉思或玄想里侠义抒情,不在大而无当的问题中徜徉,逃避尖锐地提问和自我审视。

这当然是一种夜行。我们苦于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如此夜行的文字和写作“命名”。

因为我们并没有成熟的、形式臻于完整的文字奉献给成熟的时代和成熟的读者——这里每一个“全称”词都需要限定,诸如“我们”。

“我们”是指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它敞开在未知的、陌生的人群里,那里或许会、甚至一定会酝酿着前面文字和文字形式的颠覆。“我们”是一个虚拟的假设。但是没有这假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同文体而是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是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时间概念。这套丛书的设施正值“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是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在经历着的。告别二十世纪,在我或我们的理解中,即回答对于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说来——这个世纪意味着什么。

换一个角度说,要摆脱中国文化重复的困境,方式之一,就是要沉淀一些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界限,使我们有可能面对将来。否则我们即使在物理时间中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实际仍生活在二十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就像许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传统阴影中一样。

这些问题大致涉及到客观真理问题(必然性、连续性、决定论、目的论都属于它的范畴),理想问题,主体性问题,方法论问题,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既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又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个体性问题,以及超验的中立性问题……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归纳。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直接论述的,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涉及到。

事实是,这些问题的深入引起的哲学的革命在西方早已发生,而在中国,它们也已然成为入思的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背景。

必须强调并区分的是,这里所说的背景,可能是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也可能是在问题的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是指引着、隐喻着超验的个体有限性的界面的敞开。它较之知识视野的横向关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纵横开阔的张力。

我们强调与语言事件相关的个人的初始经验。

即日常语言说的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如果不流失于重复的记忆,那它一定被置换了背景,即它一定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

这种反身观照已经是语言化的,即经历着既成语言向生成语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在二十世纪问题的审视中已成为个体案例的分析,由此二十世纪的问题,即便是西方的问题,也不再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性的取舍,而是一种切身着的问题的表达或表达的契机。

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将问题尖锐化以冲破传统的努力,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远流长和历史理性主义的坚不可摧几乎不可能让自律个体崭露生命的头角。

于是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意识背景出发,接近着、或者提出了汉语言哲学的问题,为着在生存、思维、表达一体的语言中找到问题的生成与转换,亦为着将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中的问题纳入可整合尤可疏导的学术规范,成为在有限的前提下可理解和可沟通的。

向关心、支持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出版界朋友致谢,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邵敏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郑西海先生,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他们的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

萌 萌

1994年12月4日于海南大学

前 言

我们这代人的辉煌年代(到中流击水?)在“文革”,那时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忠诚”二字。“忠诚”的“诚”以“忠”字为前提,因为只有这个“忠”字才有所指;对象具体了,“诚”也就落到了实处。所以那时候满世界写的就是这个“忠”字。“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包括两方面的测试,一是看谁心红,这“心红”也很具体,主要是把友情、亲情、爱情与党和领袖的恩情比,就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测试是非常日常化的,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体现出来,总之干什么都要先想到“恩”,而且是一种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恩”。但仍有许多人觉得这种测试不过瘾,于是真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比一比,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怕死。所以第二方面就是渴望生死考验。那时候的我们真是整日生活在想象的考验之中,比如抢险救灾、冲进火里救人、跳到河里打捞公物或与阶级敌人展开生死搏斗等等。当然最大的生死考验还是战争。人们无形中都希望着这一时刻早点到来,那时所受的一切教育也是为了使入能经受住这一考验。战争对我们来说不但意味着是消灭战争,给人类带来永久和平的唯一手段,而且也只有

在战争中才能使人体会到党与领袖的恩情,体会到“革命友谊”这几个字的份量。从“文革”年代过来的我们在提到“革命友谊”时,多少都有些“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意思,就如同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只要打仗的目的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也就不言而喻似的。

所以“文革”年代的“忠诚”二字基本是连在一起的;但中文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词组中的字都可以独自再与别的字组成新的词组,比如“忠诚”中的“忠”,基本含意是“忠实”,“诚”也主要指“诚实”。如果讲的是对党、对领袖的“忠”,那就是“忠实”,如果讲的是为人处世的“诚”,那就指的“诚实”。

我们从很小起,所接受的有关“诚实”的教育就是“不说谎”。这里的“不说谎”也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涉及到组织(忠、恩),再是涉及到他人(诚、情)。正因为组织体现着“恩情”,是“忠实”的对象,所以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讲,都是“亲情”与“诚实”的前提和保证。哪怕“诚实”再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在那个年代也首先要求的是对组织上的“忠实”。二者在当时是被说成是统一的。

我这样慢慢回忆着描述“忠诚”一词中“忠”与“诚”,包括“忠实”与“诚实”间的关系,是因为从“忠诚”二字不可分,“诚”依附于“忠”,到“诚实”(对他人)需靠“忠实”(对组织)的保证,再到“忠”、“诚”二字渐渐剥离开来,使大家在政治标准(忠)之外寻求新的处世原则(诚),这一演变过程其实也隐约透露着我们这代人思想感情上的变化过程。其间关键的一步在于这个与“实”(真实)字相连的“真”字的出现。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何种情况下才猛然遭遇到了这个“真”字的呢?作为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研究课题,这实在发人深省。

“诚实”是要求不说谎，但天下恐怕没有人未说过谎，界限只在说谎的大小与范围。有时候说谎的动机是好的，有时候也有“不得不”的苦衷。所有这一切就生活的日常性而言总是难免的，周围的人也大都理解。真正严重的问题只发生在必须对组织说谎时；当然也正是在这种严重中，“诚实”与“忠实”才面临必须择一的选择。选择也就是选择使一种谎言能够成立的理由；除过利益上的得失外，能说得上口的就是“忠实”、“诚实”中的这个“实”字了。

“实”当然是“真实”的“实”。但在相当长时间里，“真实”一词都被覆盖在“真理”的巨大阴影之下。

什么是真理？虽说那个年代不大懂得定义是怎么一回事，但大家又似乎都以为真理是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正如“忠”与“诚”、“忠实”与“诚实”也不需要讨论一样。作为一种组词方式，比如讲“忠实于党”是可以的，但如果讲的是“党的教育事业”或“共产主义理想”，则大家更多用的是“忠诚”而不是“忠实”。也有坚持要用“忠实”的，但那主要出自一种很现实的考虑，想把对某种较为抽象（比如“事业”、“理想”等）、主要涉及人心理状态的要求具体化为外在行为上的约束，或在“可操作性”上使其规范化。就真理对人的要求而言，是“忠实”还是“忠诚”？“文革”时的红卫兵曾就这两个词有过小小的辩论：坚持“忠实”的也就如同坚持“诚”必须依附于“忠”一样，着眼于眼下利益与现实需要；而强调“忠诚”的则更多体现着信念与理想的力量。就对“事业”、“理想”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的理解而言，显然“忠诚”说占了上风，但“文革”中的这批人又正是最狂热、最富有献身精神也最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迫害的一批人。

说到这个“诚”字，说到信念与理想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我们

4 前 言

长久以来所理解的那个“实”字,即使得人生有了价值、有了追求的“真理”。

真理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种对精神状态上的要求。“诚”之所以远较“忠”既更为抽象(就事业、理想而言)又更为具体(就人之为人行为准则而言),就在于“真理”一词也具有同样的品格。真理的抽象性涉及到信念与理想的力量,而其具体性则与我们心目中的勇敢、坚定、奋不顾身等人物形象(如刘胡兰、董存瑞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忠”与“诚”的剥离主要是政治风云的变化过于剧烈的话,“真实”与“真理”的不统一又和我们在读书中慢慢形成的理论素养有关,于是在人们心目中,“忠”与“忠实”要求着“真实”,其实也就是现实的眼光,而“诚”或“诚实”则追求的是“真理”,体现着理想与信念的力量。从另一角度看,真实与真理的关系也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真实讲的是事实,而真理则要求着价值上的认可,绝对真理体现的就是绝对价值。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事实,而在于告诉了我们事实与立场的关系,从而促使我们改造世界观,达到善的极致。所以重要的不在于知道事实“是”什么,而在于懂得自己“该”怎么做。

真理基本上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这一点是从很小时候起就深入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它信念化、理想化了;当时一批最有思想的红卫兵也自觉依靠信念与理想的力量来抵制任何所谓“事实”、“真实”的诱惑,甚至自觉到连“真实”这样的词都不想触及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切社会变革,包括平反冤假错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等,都起到了把我们这代人从过去的理想与信念拉回到眼下的“事实”的作用,“忠”

或“忠实”重新压倒了“诚”或“诚实”，但这时的“忠实”主要指忠实于事实。

“文革”20年后，也就是1986年左右，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最先着手剥离的就是真实与真诚，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那时已把过去的真诚等同于一种浪漫情怀，同时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又不得不以幽默来为自己开脱，设法使自我达成一种和解，否则人可真疯了不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拿人的真诚、拿人的理想与信念、拿人的执著与价值开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玩笑毕竟太大了，大到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地步。

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真理”这个概念的清算。“真理”这个词已不再意味着非语言的实在，哪怕它确属实在；语言也不再透明，不再使我们能一眼就看清命题与实在的相符一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剥离与清算是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才逐步成为了自己的学术志向的。一旦“真理”这个词语的意义成为问题，一旦我们所信仰着的“真理”只意味着命题的真假，一旦命题的真假又与命题是如何有效、如何被我们接受的纠缠在一起，真理则更多涉及到人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甚至主要是个词语用法问题、表达问题。

这种情况下的“真实”也遭受到了动摇，更谈不上无条件的“忠实”，因为哪怕是再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要能为我们所经验，也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对词语的感知能力。

那么什么才是真理的真相，才是忠实、诚实、真实、真诚的真相呢？当这些词语作为概念成为了思考的对象时，按照一位哲学家的说法，我们这些人事实上也就从“拯救世界”的伦理冲动转向了充满“好奇心”的学术兴趣。

然而这种学术兴趣,就人的现实生活态度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真理(理想与信念)的丧失为代价的,这毕竟又不仅仅只是个学术兴趣问题。我们这个一直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古老国度,一部近代史几乎也就是一部在改变其“自然状态”的同时也丧失其“古老”的历史;这里的“自然状态”指的是作为现存事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保持自然和谐的“前习惯水平”(哈贝马斯语),这里的“古老”指的是使我们这个民族被规范化所调整好了的作为人际关系的总体性,如社会、制度、传统、风俗、文化价值等等。总之这里涉及到两种总体性的丧失,一是空间性的,一是时间性的。空间的丧失与夺回就有了“一步跨入”的梦呓,想在原始的和自然的状态丧失后一跃而成为最不原始、也最不自然的“世界历史”的中心;时间的丧失与夺回则使我们的现实充满着“随机的时间”,人们生活在丧失了理想与信念后的琐碎实践和纯粹功利性的随机追逐之中,既没有了传统的虔诚,也没有了诗的梦想。

总之从忠到诚到实,与从真理到真实到真相,大体上是一个同步演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真相”的追问始终构成这本书的主题。与此主题紧密相联系的有四个词,即话语(如真理、规律)、主体(如自我、心灵)、反思(如时空、处境)、剥离(如真实与真理、事实与价值)。记得最早学外语时,老师曾要求“四会”:听、说、读、写。按照这四个字的要求,我把本书的内容也列为甲、乙、丙、丁四章。第一章是“听”,实际上是禁不住现实的诱惑,所以心也就始终沉不下来。这章的内容主要是散文与随笔,表明那种想“介入”现实的冲动始终在“真相与诱惑”中来回摇摆。第二章是“说”,辑录的也都是自己在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和在各种学术报告上的演讲,但实际上这种“说”只能说成是“话

说”，因为是“话”（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话语方式）通过“我”来“说”，这就关系到了“话”与“说”以及“我”的当代性问题。第三章自然是“读”，也就是自己对电影、小说、艺术作品以及别人的著作、论文的“解读”。“解读”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反思的过程，对现实的诱惑，对“话说”之“话”的反思。也许这本书中最好的内容就在这一章里。我们现在的思想表达，还不得不借助于外在的“对象”（话题），有了“对象”，在解读中才好重新构筑它，认识它，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的构筑活动、认识活动的再认识，同时努力带出反思活动本身的处境感。这种处境感也是一种内在于人的自我能力的表现，但它不再是过去所认可的“主体性”、“心灵自我”，甚至也不是胡塞尔的“纯思”或“超验的我”，而更多具有一种感性的意味。在人的感性存在方式与知觉能力中，是否最终具有一种单一的感性形式来弥合理性的裂痕，这毕竟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无疑是针对着传统的时空总体（天人合一）和近代认识论的总体暴政（绝对理性）而来的。第四章的内容是“写”，实际上通过几篇论文来反映自我的剥离过程，如“忠”与“诚”，“真实”与“真诚”，事实与价值等等。最后两篇文章全是关于“文革话语”的，它也构成我目前正在着手的另一本书的框架，因为谈到“文革话语”，总离不开那种“话说”的知识背景，离不开就我们存在方式而言的自我反思和我们在理论上必须竭尽全力加以敞开的“何谓当代”问题。

1996年元旦于海大

目 录

前言	1
----------	---

诱 惑

知的执著与思的迷惘

——关于哲学如何达到可理解性的自白	3
越来越轻省的回忆	20
岩石在说什么？——随感二则	27
人读书与书读人	33
为什么来海南？	45
真相与诱惑——一篇读书笔记	50

话 说

我们怎样表达？	63
关于上帝的对话	68
叙事的结构与意义	79
主体的纯粹形式与文化人类学	106
哲学与现代人处境	119
社会现象在意识中的被动发生问题	133
作为一个释义学话题的“回到事情本身”	140

反 思

A 为何恐惧?——也谈《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161
人如何与现实和解·····	175
口语语境的可推理性原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181
鬼影幢幢的文化氛围——我看《施洗的河》·····	196
意淫与禅让,说法与做法·····	206
吹尽狂沙始到金·····	213
“有意而为之”中的“意”与“为”·····	222
跳出手掌心——王小波的浪漫与幽默·····	234

剥 离

存在与价值的剥离——文化讨论中的一种态度·····	259
“解”后现代之“后”·····	264
“世上先有是事”——水浒世界之“是”与“事”·····	271
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	285
“文革话语”管窥·····	294
再谈“文革话语”·····	302
剥离的三重性与三重剥离(代后记)·····	319

诱惑

